

探尋前沿的視角可能性： 代替評論的回響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
台北：群學，2010年，548頁。

能有機會評論黃金麟、汪宏倫與黃崇憲三位教授所編的《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一書，個人備感榮幸，卻也極度的惶恐。這不但是因為本書涵蓋了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家庭、文學、消費文化、福利國家、公民權與身體、科技與風險……衆多的面向，且撰文的專家皆各領域一時之選，每篇都有深入的剖析與探討，我實在沒有能力一一予以評論；更因為現代性本身就是個極複雜的議題，而相關研究與討論的累積也已多到難以盡窺，因此連要從場域與系譜的角度脈絡化本書，對其做一起碼的定位，亦非我力所能及。¹基於這樣的理由與考量，我將採取有別於一般書評的方式評論，把重點放在抒發自己的共鳴與觀點，希望能藉此回響回饋於本書的提問，並有助於開展本書所欲促進的現代性的問題意識，豐富我們觀察的視野。以下，我先概略介紹本書的主旨，勾勒其特徵，再挑出我自己特別感興趣的議題與面向討論。

《帝國邊緣》一書開宗明義點出「針對現代性在台灣的開出與在地化發展」（頁IX）做探討，並「嘗試使用『帝國邊緣』來捕捉台灣

1 事實上，本書的〈導論〉及第二章〈「現代性」的多義性／多重向度〉已為如何理解現代性提供了不錯的起點，不在此贅述。以華語資源來說，另可參考汪民安等(2005)編輯的《現代性基本讀本》，由選文即可見現代性議題涉及面向之廣，實有賴集眾人之力探討。

現代性的特質……因為現代性在台灣的濫觴與開展，自始即與台灣所處的帝國統治邊緣位置有關」（頁 8）。換句話說，台灣的現代化是所謂「後發外生」型（頁 48），「台灣現代性的發展動力並非全然出自內在。這是其特質也是其限制」（頁 11）。基於這樣的想法，本書雖以「20 世紀的在地現代性發展」為考察重心，但同時也強調「長時程的觀察和探究……的視野」（頁 X），以探討從荷據、明鄭、清領、日治以迄戰後的整個歷史發展為原則。在前述思路與「緊扣台灣的歷史發展脈絡……避免『離事而言理』」（頁 9）的方針指引下，全書突顯並描繪了台灣現代性的混雜特色，不但極重視殖民現代性的問題，也觸及了多元及另類現代性的議題。

此外，本書為數不多的圖表，如現代性的多義性與多重向度（頁 27）、現代性進程的歷史分期及核心特徵（頁 35）、台灣與世界的歷史關係類型（頁 68）、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分期和特色（頁 141）、台灣社會不同時期的法律多元主義（頁 207），以及「現代」與「後現代」的對比等，綱舉目張地為這些繁複的、兼具學術與現實重要性的問題，繪製了一份知識地圖，既幫讀者省下不少整理功夫，又可供做進一步討論的基礎。特別是，本書將讀者定位在「所有對現代性課題有興趣的學生、學者和一般閱讀大眾」（頁 X），清楚地展現了以紮實的學術研究介入現實發展的雄心壯志。

儘管我沒有能力，更無資格論斷本書的成就，但我想確切無疑的是，這本書不但是台灣學界首次深入探討現代性議題「集體智慧的結晶」（頁 IX），更已立下後人在討論台灣現代性問題上無法繞過的里程碑，套用編者們的話來說，「雖然遲到，但仍有及時的意義」（頁 19）。因此，我選擇以共襄盛學的方式向本書致敬，以〈導論〉與第二章的結語點到的問題作為開展我討論的起點，接棒參與此一「未竟之業」與「歷史共業」的討論（頁 17），「糾正長期以來」以為非西方文明只有「『遲到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的偏見」（頁 56），並由此觀點出發，與本書作者們商榷其所描繪出的歷史圖像的問題。

如本書第一章所指出的，現代性基本意涵之一是作為歷史分期的概念。然而，對於一般而言的現代性，以及作為本書主要探討對象的台灣現代性，究竟始於何時，全書似無統一的說法。例如，有作者認為「文藝復興掀開了現代性的序幕」（頁320），²但我懷疑這是十三位作者的共識（見頁28-30, 35-36, 48, 64-65, 104-105, 258, 284, 313, 397的不同分期）。同樣地，儘管主編聲稱「日治之前的帝國統治與海外貿易，也是討論台灣現代性不能切割的緣起」（頁10），但仍有作者做出「台灣的現代性從日本統治開始展開」（頁482）的一般性斷定，而忽略了標明領域限定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其實，三位主編清楚地「意識到……落差……做了不少編輯上的努力，希望減少篇章間可能產生內容重疊或斷裂的問題」（頁X）。我無意否定他們清晰可見的努力，只是想藉此指出統一的內在困難。

當我們面對現代性為何，又該如何分期的問題時，所涉及的不是個簡單的事實認定問題，因為如何認定總會牽涉到背後作為指導的概念內涵。換句話說，任何的事實認定都必定牽涉到據以做出觀察，也就是能予以辨識並指稱的區分架構。扣緊歷史發展脈絡，避免離事而言理固然是值得稱許的優點，但對觀察視角與架構進行自我反省，恐怕也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否則將不知道自己看不見什麼。³我們不能因為已經久了、習慣了，就不假思索地假定，探討台灣現代性時不需「避免『結構對應論』與『橫向移植』的陷阱」（頁516）之類的問題，而只把這類的問題留給較為新潮的後現代（性）。⁴

以本書呈現的面貌來看，這個集體努力的工作似乎並未建立在一個經討論後確立的、理解現代性的共同架構基礎上，因此在此我只好

2 這其實不令人訝異，因為文藝復興的「意象」恰足以象徵「現代」，以致在日後西方與東方，特別是日本的歷史著作裡，往往把文藝復興視為現代的起點，乃至成為通說（Brace 1961; Green 1992; 宮崎市定 1992）。

3 或者，用顧忠華(2006: 71)的話來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如何尋找一個制高點，來鳥瞰整個台灣在現代性議題上的『歷史定位』」，是我們必須正面面對的挑戰。

4 必須指出的是，本書作者之一曾銜接上朱元鴻的說法，援引 Latour 用過的標題提問「我們曾經現代過嗎？」（頁517）。

以〈導論〉中的界說權充所有作者都接受的理論前提，提出我的一些不同想法。雖然〈導論〉在介紹此一集體計畫的歷史因緣時，曾觸及不少複雜的面向，但最後鎖定在反思性或反身性上，認為「現代性是一個不退流行的行當，是個不斷站在勢頭前端的探問，與永無休止的追尋」（頁4），強調「現代性是一個存有的狀態與意識……除非這個世界被重新迷魅化(re-enchanted)，人們停止對當下處境進行反思、批判與追尋」（頁5），否則必將「不斷自我繁衍」，永不會過時。甚至，雖然現代性不是個「具有目的論性質的理性主義計畫」，卻「猶如未竟之『業』(karma)……是我們必須承繼，且不斷參與的人類歷史共業」（頁19）。

這樣的說法不但言之成理，也是主張現代性始於十七世紀啓蒙運動的論述一向擁護的看法。只是，細究之下，這樣的觀點或有可再斟酌之處。第一，這套論述只看到或只側重啓蒙／浪漫（或是理性／反諷）這組區分的一側，忽視了現代社會其實同時兼具這兩種特質(Fritscher 1996)。與此相關連但又有所區別的是，對社會的描述不脫套套邏輯（社會如其所是）與弔詭（社會不如其所是）兩種模式，但不管是採取實證還是批判的視角，同樣都是社會的自我觀察，都是社會本身的運作(Luhmann 1988)。我們再也找不到外部的立足點，因此必須把自我指涉的問題、把觀察與語意所能起的建構現實的作用納入考慮。

第二，這種以「反思當下」為現代性核心特徵的觀點，很容易模糊掉現代（性）的時代特性。例如，本書第二章提及作為形容詞的「現代」淵遠流長，指「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複的歷史時間意識……首次見於五世紀末」（頁28），似隱涵五世紀即可標示為「現代（性）」的特殊時間觀念。⁵這不令人訝異，因為「反思當下」或是感受到「新的時代」，是極為普遍的人類經驗。但若僅以此為分期的

5 Delanty (2006: 269)認為據稱是首度使用此詞的教皇哲拉修一世(Pope Gelasius)可視為第一個「現代主義者」(modernist)，便有同樣問題。

依據或視之為現代性的起源，從概念史的觀點來看，是頗有疑義的。五世紀時雖在區辨基督徒與異教徒的脈絡下產生了古今之辨的「現代」意識，但整個時代氣氛基本上還是崇古的，厚古薄今。到了十二世紀，西方對「現代」的負面評價才開始減弱。但即便十四世紀起的文藝復興開始強調重視當代，也還沒有把今抬高到壓過古的地位，而仍是以復古為訴求。一直要到十六、十七世紀以後，「現代」才變成全然正面的(Gumbrecht 1978)。所以，現代（性）的確涉及時間意識的轉換，但重點恐怕不只在於線性時間觀，而在於「線性的進步時間觀」這個特殊組合。換句話說，現代的時代意識不單強調從過去解放出來，更主張未來是個開放的未來，充滿了可能性且應正面看待，而人們正可以且應該以現在為槓桿，朝所欲的方向（啓蒙、理性、進步？）轉變，此所以在形塑人們如何理解現在的比重上，朝向過去的「經驗空間」與面向未來的「期望界域」有此消彼長的變化(Blumenberg 1983; Delanty 2006: 268-70; Koselleck 1985, 2002)。

第三，即便我們以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懷疑、反思精神為現代性的開端，還是很容易遭致異議。例如，這種自我懷疑的精神在十七世紀剛誕生的時候，宣稱自己既是普遍的(universal)，又是絕對的(absolute)。但在後來的實踐裡，當它遭遇到階級、性別、文化等種種的差異，它開始發現，如果它想貫徹普遍的自我懷疑精神的話，就必須承認自己並非如原初設想般絕對。面對這個兩難的解決方式之一，是引入現代與後現代的區分，正面肯定多元與差異(Welsch 2002: Ch. 3)。

這就觸及語意與社會結構區分的問題，也是我想談的第四點：對社會學家來說，以反思當下或自我質疑來界定現代（性）就夠了嗎？如編者們在援用魯曼(Luhmann 1995a, 1995b)的觀點時也注意到的，現代的「反思當下」與之前的類似實踐有個「關鍵不同，在於現代人乃是以自身為理據……失卻一個外在的阿基米德支點」（頁5）。這不正點出現代時間意識的形成有其結構條件、社會條件嗎？以不斷自我反思、質疑的存在狀態界定現代（性），比較像是哲學家或文學批評

家的用法，從時間意識的轉變切入，才比較接近史學家與社會學家的觀點，但仍然未祭出社會學的看法與謀生本領：社會結構。⁶

本書編者們與作者們既然偏好現代性這樣的概念，而「性」(ty)一字在英文裡向來指涉性質或狀態，讀者不免會期待他們清楚交待所認定的現代社會的性質與狀態為何，好掌握、了解他們觀察的依據為何。借用本書作者的話來說，「後現代與現代相同，至少包含了『客觀／實存』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與『主觀／規範』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兩個面向」(頁 510)。問題是，我們真地掌握到或講清楚現代社會客觀實存的性質了嗎？⁷ 現代——特別是德文裡 *Neuzeit* 的概念——不正明告大家它只是個時間性的區分嗎？當「現代」的時代意識浮現後，西歐社會致力於建構中世紀的黑暗形象，好對照出自己的新穎與進步(Hollister 1992; Koselleck 2002)，同時也就揭露了還無法清楚掌握自己究竟是什麼的事實，仍無能力為自己命名，以致只能以時間的先後來標示、指稱自己是個全新的時代(Luhmann 1998: Ch. 1)。問題是，到底新在哪裡呢？有無可能找到時間以外的判準？

編者們援用魯曼的說法，卻忽略了他關於語意與社會結構的區分，特別是他關於現代社會結構，也就是功能分化的討論。然而，依魯曼的說法，社會學對社會自我描述所做的顯著貢獻，卻正在於「無法忽略全社會再生產之運作的與結構的層次」(Luhmann 1995a: 178)。儘管如此，編者們前述的說法仍不經意地點出自我奠基與失卻外在的阿基米德點兩個重要特徵，而這正指向魯曼所主張的功能分化與世界社會的觀點。而且，這兩點是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功能系統的二元符碼化具有世界建構的傾向，促使現代功能分化社會擴張為世界社會，將所有的溝通納入同一個社會系統（比較 Toulmin 1994）。

6 反諷的是，唯一明確提及社會學習見的以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兩大結構變遷作為界定現代性開端觀點的，是文學研究者廖咸浩（頁 397）

7 我認為現代「性」的講法極易陷入本質主義的陷阱，當我們還搞不清楚它究竟是什麼時，尤其如此，不如講現代或現代社會就好（湯志傑 2005）。

我認為引入語意與結構的區分，有助於我們釐清許多問題。首先，我們可以把後現代的相關論述定位在語意的層次，它們不過是對嚴格來說整個功能分化結構仍未改變的現代社會的自我描述罷了。換用現代性的語彙來說，我們可以說文化現代性的發展一定程度上落後於社會的現代性，就如「觀察」一定意義上晚於「運作」一樣。從這個角度來說，後現代（性）的提出，既是對現代的反思，也是補課，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更心甘情願地接受（現代社會）多元的現實。其實，各個功能系統自我奠基、自我立法的情形並未改變。現代社會早確立了功能分化的多元結構，韋伯著名的〈中間考察〉一文中諸神之戰的比喻便已清楚點出這個事實，而這也是社會之所以能有多元觀點的制度保障（湯志傑 2009）。事實上，儘管後現代的講法曾風行好一陣子，但偏愛從社會結構觀點入手的社會學家們，多半傾向現代社會迄今仍無根本結構性改變的觀點，所謂「反身現代性」、「基進化的現代」、「高漲的現代性」（頁 469、513）等概念的提出，正反映這樣的看法，而本書一些作者似亦有類似看法（如頁 40、470；另可見 Delanty 2006）。

其次，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歷史分期與現代性「起源」的問題。在西方，現代性作為字詞，是到十八、九世紀才出現與流行的（Goldstone 1998; Koselleck 2002），這與社會學傳統上習慣以十八世紀晚期的兩大革命——也就是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來標示現代社會的誕生，若合符節。然而，這是社會學的概念界定與使用方式。有別於此，史學家關心的往往是起源與分期的問題，因此他們會習慣性地以事後回溯的方式往前追，並以重大事件為歷史分期的界標，所以不但把現代的開端上推到 1500 年前後（如 1517 年的宗教改革、1492 年哥倫布抵達美洲或 1453 年康士坦丁陷落），甚至提前到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而且還導致了 "early modern" 概念的出現。

更重要的是，隨著西方十九世紀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優勢，「西方興起」、「歐洲發現世界」的學術與大眾論述逐漸形成，把西方當前的優勢歸結為現代性（或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是因

為西方率先發展出諸如民族國家、現代科學、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等現代文明，才得以贏得霸權，支配其他地區與文明。⁸不只如此，衆多歷史的或社會學的研究在追溯西方何以興起，或探討、解釋西方何以贏得霸權時，不時會歸因於某些看似本質或必然的因素，近一點的像追到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或早一點的民族國家與科學革命，甚至追到文藝復興，更有一路往前回溯到基督教文明與古希臘、羅馬傳統的，彷彿西方自始就注定享有優勢一般。⁹在西方文明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下，不少其他地區的民衆與知識分子也常不假反省地就把這樣的論述與歸因視為真理，而未曾注意到西方文明奪得霸權的歷史偶連性（如見 Goldstone 2009; Wallerstein 1999）。

本書編者們自我期許「能為將來『台灣的現代性批判』建立基礎」（頁 19），可惜沒有把同樣的反省功夫用在批判現代性上。雖然作者彼此間沒有建立如何界定現代性的共同架構，但多數作者似仍共享一未明言的共識，也就是假定西方為現代性的起源，之後才擴散到世界各地。例如，有人說「現代性指涉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發展出來的『理性』與『進步』」（頁 171），而「消費／消費文化隨著西方現代性的普同觀點也被推廣到世界其他地區」（頁 357-8），台灣是「現代法律的輸入國……『子國』」（頁 204），因此實際情形是「法律多元主義」（頁 208）。一言以蔽之，台灣的現代性「交錯著西方現代性和殖民現代性對台灣的影響」（頁 X）。本書作者們會持這樣的觀點完全可以理解，也無可厚非，畢竟這是長期累積下來、不斷強化的標準看法。我只是在想，或許值得重新玩味細思一下這個問題，探索看看有無不同觀點的可能。就像台灣地圖一樣，如果我們換個視角翻轉一下，有無可能把台灣從（帝國）邊緣變成（帝國與現代性的）

8 對此，可參考如 Jean Baechler, Jared M. Diamond, Jack A. Goldstone, John A. Hall, Eric L. Jones, Douglas Johnson, Michael Mann, David S. Landes, William Hardy McNeill 等人的相關著作。因篇幅有限，無法在此一一列舉，尚祈見諒，以下亦同。

9 例如參見 Richard M. Brace, Michael Mitterauer, Rodney Stark 等人的著作，以及 Dietrich Gerhard 討論歷史分期時涉及此的討論。諷刺的是，Delanty (2006: 269) 在討論如何逃離歐洲中心主義的論文中依然主張，現代性在歐洲的茁生，原則上要歸功於基督教；可見要掙脫既有的俗見(doxa)是多麼地困難。

前沿呢？

例如，改從後殖民與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前述的標準看法便不無可爭議之處。¹⁰ 本書第三章與第五章雖曾援引世界體系與布勞岱長時段的視角，可惜未注意到「西方霸權之前的東方霸權」、「西方文明的東方根源」、「重新面向東方」、「大分流」等諸多重要的後繼相關討論，¹¹ 以及日益興盛的，希望超越二元對立格局，改從連結、互動、整合、共享、跨越、彼此糾結等角度重寫世界史、全球史與區域史的取徑。¹² 如果我們把這些討論納入研究的視野，援引為討論的資源，還可進一步由此延伸出去，銜接上關於多元現代性、另類現代性、彼此糾結的現代性、現代性的偶連性、全球現代化，以及重新檢討所謂 "early modern" 的概念等晚近日益熱門的討論。¹³

幸而，前述議題雖不是全書明白標舉的視野與問題意識，仍有少數作者觸及，例如黃崇憲撰寫的第一章便是以「邁向後殖民的多元／另類現代性」為結語（頁 55-59）。另外像導論中提及的座談會，廖炳惠也提過另類、單一及多元現代性的觀點（頁 3）。令社會學者感到汗顏的是，全書中實際針對「另類現代性」議題進行歷史的爬梳，以及唯一注意到所謂「本土現代性」問題的，只有文學研究者廖咸浩（頁 402-409）。¹⁴ 我認為「現代性在地化」的問題意識是對的，只是

10 除 Perdue (1999) 破除關於中國迷思的論文，以及 *Science and Society* 67 卷 2 期關於歐洲中心主義與中國中心主義的專題座談外，另見 James M. Blaut, Dipesh Chakrabarty, Sebastian Conrad, Marshall G. S. Hodgson, Gregor McLellan, Shalini Randeria,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的相關著作。

11 但廖咸浩（頁 397 註 1）曾注意到這一點。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 Janet L. Abu-Lughod, Christopher Chase-Dunn, K. N. Chaudhuri, Andre Gunder Frank, Stewart Gordon, John M. Hobson, Kenneth Pomeranz 等人的著作。

12 此一史觀轉變的具體例子，如 1963 年以撰寫《西方的興起》一書聞名的 William H. McNeill，在該書中雖也考慮了不同地區與文明互動的問題，卻仍免不了「西方興起」的意識形態，但他 2003 年出版與兒子合作重寫的世界史時，便以《人類之網》為名。這方面的相關著作可參考濱下武志、Giovanni Arrighi, Jerry H. Bentley, Gurminder K. Bhambra, John Coatsworth, Philip D. Curtin, Joseph Fletcher, Toby E. Huff, Victor B. Lieberman, Robert B. Marks, Eric Mielants, Anthony Reid, Robert W. Strayer, Sanjay Subrahmanyam, James D. Tracy, Michael Werner, Bénédicte Zimmermann 等人的研究。

13 可參考岸本美緒 (Kishimoto Mio)、Shmuel N. Eisenstadt, Jack A. Goldstone, Bruce M. Knauft, Wolfgang Knöbl, Alberto Martinelli, Donald M. Nonini, Aihwa Ong, Wolfgang Reinhard, Thomas Schwinn, Göran Therborn, Björn Wittrock 等人的相關著作。

14 這其實不特別令人意外，因為類似的問題意識在文學研究裡十分流行（例如參見王德

目前「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提法，似乎還有可再斟酌之處。這個概念雖有助於改正把現代性視為同質與統一(uniformity)的想法，但似乎仍隱隱假定了單一的起源與普遍的規範(Delanty 2006: 271)。換句話說，這種講法依然奉歐洲為現代性無可置疑的「發源地」，現代性在歐洲是「內生的」發展，而「另類」現代性的出現，不過是因為其他地區在學習、繼受的過程中不免產生的變異，乃至預設在中國研究中已備受檢討、批評的衝擊—回應模型（見頁 57；比較 Cohen 1984）。¹⁵

如果我們改以本土（台灣或中國）為中心的視角出發，同時又能把這段歷史放進世界史的脈絡來理解，或是借用書裡的話來說，考察「地方與世界這兩種力量在當下的互動過程與形式」（頁 67）的話，我們或許會發現到，位居華夏帝國邊緣的台灣，當時可能正處於幾組（帝國？）勢力彼此接觸、較勁的前沿。原本大陸中心觀點下位居邊緣位置的大陸東南沿海，特別是台灣，隨著鑲嵌進形成中且日益蓬勃的世界貿易體系，搖身一變為海洋取向的前沿，這個獨特的利基與暱棲(niche)，讓台灣成為某種現代性實驗的前沿。例如，普遍公認為現代企業組織源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便是西方有組織地往東方拓展勢力下的產物，也是最早進入台灣的西方勢力之一。有趣的是，這間帶動資本主義及其相關制度發展的公司，是當時歐洲諸強權國家中最不集權、最不像國家的國家裡所成立的集權、國家化組織。它讓原本是簽下賣身契的小兵或是因逃債而出走的人，在許多事情仍全看出身和階級決定的年代裡，有機會躡升為總督、公司理事和司令官（卜正民 (Brook) 2009: 31, 88-93；魏而思(Wills) 2001: 105），打破原本階層分化的秩序。正是這種變通、適應的特性與長處，使得實際面對海外殖

成、陳芳明、廖炳惠等人相關的討論）。雖然這一定程度上受研究對象影響，但社會學者在此議題上的相對缺席仍令人不無遺憾。

15 編者們也認為「越是要否認現代性的單一普遍性，越是證成現代性的單一普遍與無遠弗屆」（頁 6）。有別於另類現代性的構想，Dussel(2002)提出「超現代性」或「橫跨的現代性」(trans-modernity)的觀點，亦即在世界體系形成的過程中，從跨區域的互動中茁生出來的，超越西方最初簡單版本的現代性，其意即在克服後現代性的提法仍不能免除的歐洲中心論的弊病。

民地的東印度公司在考量各地不同需求的情況下，反較母國更早制定出一套統一的法典。換句話說，「在現代性的空間的分佈上，其實由一開始便是多元的，不見得任何新的發明都是先在西方產生，再移植到非西方地區」，而台灣正參與到此一建構「普遍性」的過程中（顧忠華 2006: 74-76）。特別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唐宋變革以來，北方雖仍能在大陸取向的華夏帝國架構下保持政治中心的地位，但經濟與文化中心卻已南移至江南，乃至東南沿海，像福建便是重要商業印刷中心所在地，那麼台灣形式上邊陲的地位，反而是個利基與暱棲：渡台的移民事實上來自中心，有管道取得創新的資源，同時卻又不必背負中心的包袱，得以快速求新求變，而殖民的陌生環境更強化了此一取向。

事實上，廖咸浩也注意到「台灣貿易的開放性格以至『國際』取向，並非在 1860 年之後才開始」。他不但以「亦商亦盜、亦俠亦儒」來定位明鄭與台灣現代性的起源，同時還點出了海洋中國現代性的議題。然而，如他引用的 Wills (1979) 指出的，我覺得鄭成功詣孔廟「焚儒服」是個意味深遠的行動，象徵了與大陸中國士大夫傳統的決裂。可惜，如我們熟知的，大陸中國一再壓服了海洋中國。由於中國的書寫文字系統是由北方發展出來的，大陸觀點的紀錄因此成爲主流，近乎有壟斷歷史書寫的優勢（許倬雲 2009: 52），以致後人常看不到或忽略海洋中國的面向。那麼全書只有蔡明璋（頁 79-82）與廖咸浩（頁 408）兩人花篇幅討論鄭氏政權，也就不足爲奇。

其實，海洋中國與東亞區域網絡的問題從 1980 年代起便日益吸引國內外學者投入研究，只是台灣社會學者仍極少注意和參與。¹⁶ 像岸本美緒便指出，在十七世紀這個白銀世紀裡，中國（明朝）的周邊（如滿洲、鄭芝龍家族與東南亞的港口國家）因爲積極參與到全球白

16 這方面除可參考註 12 從連結角度重寫區域史提及的文獻及《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系列外，另可參考松浦章、張彬村、王康武、蔡石山、Leonard Blussé, Hugh R. Clark, John Lee, Lynn A. Struve, John E. Wills, Jr. 等人的相關著作。此外，在注意到東亞近代經濟區域網絡連結的同時，也須考慮到東亞在近代政治上是由合走向分（葛兆光 2011）。

銀流動促成的對外貿易中，不但商業與市場蓬勃發展，多族裔與高度社會流動的背景也刺激了制度的創新與發展，遠較廣土眾民、慣性甚大的中國更有彈性而先進。明朝崩潰後並非由農民出身的李自成取而代之，而是由滿洲與明鄭這兩個崛起於週邊白銀帶的軍事—商業權力爭霸，正點出這個事實（Kishimoto, n.d.；另見卜正民 2009: Ch. 6）。基於從貿易的角度來看，東亞在十六到十八世紀的發展可找到一共同的歷史節奏，而且與歐洲十七世紀的危機極為類似，岸本因此認為不妨將這個時期的中國也稱做 "early modern"。

這就帶出前面提到過，但還來不及討論的 "early modern"（近代早期還是早期現代？）的概念。根據 Goldstone (1998) 的研究，這個概念的誕生，跟 Eric John Hobsbawm 引發的關於十七世紀危機的辯論有關，也就是根據生產模式進行歷史分期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設法解決如何命名介於十六到十八世紀之間，既非封建、亦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的難題時，所找到的出路。如 Goldstone 一針見血地指出的，"early modern" 是個有問題的概念，因為它既非「現代的」，也不是現代性的「早期」形式，更預設了歷史必然往現代發展的目的論。儘管如此，由於它不但可為研究與歷史書寫提供簡便的時間參考架構，而且可用來指稱非西方地區歷史上不遜於西方的發展，因此廣泛獲得使用，還誘導不少學者以「商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甚至「蓬勃的商業活動」來界定 "early modern"。

這種從生產模式概念出發，仍隱然預設線性演化的觀點自然不足取。光以市場經濟或商業與消費文化來界定 "early modern"，顯然也過於簡單、寬鬆。那麼，我們如何能有新的歷史分期架構書寫世界史，¹⁷ 並在參照它的基礎上定位（中國與台灣）本土的發展？¹⁸ 特別是，這

17 相關的討論與分期建議見 Jerry H. Bentley, John Coatsworth, William A. Green, Peter Stearns 等人的著作。

18 這點可參考 von Glahn (2003) 關於如何想像前現代中國的各種進路的詳盡整理與討論，本文不少引用文獻的最初線索即來自該文。另外可參考 Adshad (2000) 關於世界史中的中國的敘事——儘管我認為他並非採取中國中心的觀點，以致一些判斷與評價不乏商榷餘地。

樣的分期有可能建立在社會結構的類型學基礎上嗎？要如何才能不落入普世迷思及結構決定論的陷阱，同時仍能進行有意義的比較？這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到了現代，世界社會已是個貨真價實的現實，而不再只是我族中心的投射，同時對現代社會的描述迄今主要又奠基於歐洲的發展經驗與西方的學術成果上。在世界社會已成為我們身處其中而無所遁逃的現實，再也無法找到可從外部施力的阿基米德點，同時西方或外來的東西也早已變成我們自己靈魂的一部分時，如何擺脫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是極困難而不易解決的問題(Dirlik 2000)。像本書中唯一探討（中國）本土現代性的廖咸浩，雖然沒用隱涵了先於或甚至遜於現代的 "early modern" 來描述，卻也只把這稱做台灣現代性的「前史」。儘管就時序先後來說的確如此，但其行文卻也透露了他似乎仍不敢正面肯定本土現代性的「現代」資格。所以他依然不免拿西方「布爾喬亞現代性」的量尺來量，只敢主張明代已經出現了「『類資本主義』的……雛型……整體觀之，與西方的現代性初始時有相當的類似」（頁 402-403）。

我認為，如多元現代性、另類現代性、全球現代性等論題指出的，對如何理論化現代性進行深刻的反省，是必然要走的出路，但如何理解、概念化「前現代的」社會也同等重要，是釐清這個問題不可或缺的另一面，可惜這卻有意無意地被忽略。至少就社會學迄今的研究成果累積來說，理論的反省與討論，以及對當前現況的分析，遠多於對過往實際歷史的爬梳與整理。或許是因為拒絕傳統早已成了現代的傳統，對我們這些非西方地區的社會學家們來說特別如此，所以我們對探討自己遙遠的過去通常興趣缺缺。然而，如果欠缺對自己歷史的深入研究作基礎，關於多元或另類現代性等的分析與比較不但容易流於表面或片面，而且也缺少強大的說服力。

在這點上，Jack Goody 晚近回歸歷史的嘗試值得注意。他 2006 年推出的《歷史之賊》或謂《盜竊歷史》，系統性地審視、反省西方學術大家著作中族群中心論問題，不但廣受矚目，更激發衆多迴響（如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6, No. 7-8, 特別辦一專號討論此書）。

他 2010 年出版的《文藝復興：一個還是多個？》與《歐亞奇蹟》，繼續拓深相關的歷史研究，反駁將西方、現代（性）本質化，以西方當前的成功反證或逆推其過去的優越，鼓吹應將歐亞大陸視為一體，西方當前的優勢地位不過是輪替的結果。

這點出了，所謂的舊世界，也就是歐亞非大陸，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上的確是互相關連的，且有許多平行發展可互相類比之處。¹⁹ 但我們恐怕不能像 Andre Gunder Frank 一樣，一下便把世界體系的歷史從五百年改寫為五千年(Frank and Barry 1993)。畢竟，各地區間的貿易與互動是否產生了結構性的關聯，是否緊密、頻繁到足以認定為同屬一個系統，還是要認真考慮的問題。不過，這至少提醒我們重新思考所謂的「全球化」論旨。如果全球化指促成位居地球上不同區域的社會共同形成一個系統的過程，其極致意謂著世界社會形成的話，那麼它絕非晚至二次大戰後才隨著「資訊時代」到來，而是在人類歷史上有過好幾波，不同的階段各有其特色，而且世界社會形成的起點大概可以上溯到 1500 年左右。²⁰ 此外，這也刺激我們反省、修正「歐洲發現世界」的命題，重新思考大航海時代或所謂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定位，以及現代社會究竟如何形成的問題。事實上，哥倫布之所以會「發現新大陸」，肇因於歐洲人憧憬抵達他們眼中的富裕國度，甚至是當時他們所認知的世界的中心：印度與中國（卜正民 2009: 34-36, 66-69; Goldstone 2009: Ch. 1）。就如 Dussel (1998: 23, note 23) 指出的，儘管哥倫布「事實上」是「第一個現代人」(the first Modern)，但他「存在上」卻非如此，因為他對世界的詮釋始終停留在文藝復興時期熱那亞人的觀點。而且，要考察世界社會的形成，不能只把目光擺在海洋的通路上，而必須考慮到亞洲游牧民族開始建立國家的重要性，特別是蒙古橫跨歐亞的影響。²¹

19 參見 Johann P. Arnason, Martin Bernal, R. I. Moore, Peter C. Perdue, Victor B. Lieberman 等人的相關著作。

20 對此，可比較 Geogfrey C. Gunn, A. G. Hopkins, Robbie Robertson, Peter N. Stearns, Göran Therborn 等人的不同看法。

21 參見 Nicola Di Cosmo, Faruk Tabak 的討論，以及 Robert L. Tignor 等人合著的世界史教科書，特別是 2002 年最初清楚標舉「一部從蒙古帝國迄今的現代世界的歷史」的版本。

從世界史的格局對不同文明進行比較與討論，不但可深化關於（多元）現代性的討論，也可銜接上社會學裡淵遠流長的，關於世界諸文明的歷史—比較分析傳統，例如像韋伯關於諸世界宗教的研究，或是後來 Benjamin Nelson 著重於探討跨文明遭遇的問題。鼓吹多元現代性概念的 Shmuel N. Eisenstadt（如 2002, 2003）更是長期致力於文明比較研究，且引發相當的共鳴，使得文明比較研究與文明分析晚近重新恢復活力。²² 雖然這背後有 911 影響的脈絡在，但我們的確可在社會學理論，以及特別是歷史社會學的領域裡，觀察到文明研究復興，或是與比較歷史研究匯流的趨勢，在北美以外的學界尤其明顯。²³

在這個從文明比較的角度重新問題化現代性的潮流中，一個值得注意，同時令人不無遺憾的現象是，就亞洲或至少東亞來說，歐美學者對日本的關注遠超過其他國家或地域。²⁴ 國際學界會以日本為研究亞洲文明的代表，對華人社會的討論和分析卻相對闕如，其實不特別令人訝異。在我看來，這不但是因為日本自明治維新「現代化」以來的表現與政經實力，使其擠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從而被視為成功的典範，更重要的是日裔學者早開其端，從自身的角度對現代、現代性等議題進行過深刻的反省與研究。²⁵ 如本書編者們在〈導論〉結語中提到的，「超克近代」是日本知識界在二十世紀初就已有的問題意識。換句話說，日本之所以會在國際學界被看見，背後固然有政經實力的支持，但其長期學術的努力，使得累積的研究成果得以為國際學界所肯定與銜接，恐怕是更為關鍵的因素，非僥倖所致。

22 除了 Eisenstadt 的眾多相關研究外，另見 Eliezer Ben-Rafael 與 Yitzhak Sternberg、Dominic Sachsenmaier 與 Jens Riedel 合編的文集。

23 在 Arnason et al. (2005) 這本標準著作外，另見 Saïd Amir Arjomand, Johann P. Arnason, Gerard Delanty, Peter Hedström, Nathalie Karagiannis, Bruce Mazlish, Donald A. Nielson, Willfried Spohn, Richard Swedberg, Edward A. Tiryakian Peter Wagner, Immanuel Wallerstein, Björn Wittrock 等人與此議題有關的著作。

24 見 Johann P. Arnason, Robert Neelly Bellah, John Clammer, Shmuel N. Eisenstadt, Carol Gluck, John H. Sagers, Jeremy C. A. Smith, Stephen Vlastos 等討論日本的著作。

25 印度學者也以後殖民或所謂屬民研究(subaltern study)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與反省，拉美學者則是發展出依賴理論，質疑中心的剝削與霸權。相對來說，建制化後的華人學術界，對現代性與現代世界的反省較少有自己鮮明的、原創的特色，亦未構成學派，而多半是追隨各種已流行的思潮。

舉例來說，日本學者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便率先提出東方，或所謂的東洋有自己的「近代」²⁶ 這樣的觀念，並且以對中國與日本歷史的實際研究來證成這個主張。像主張唐宋變革論的內藤湖南(1992, 2004)，便認為中國的近代始於宋代，較西方為早。而內藤從事這項研究及提出這樣的主張，正是在回應所謂東洋的近（現）代性的問題。這代表的是日本脫亞入歐的企圖一定程度實現，同時卻也遭致失望後，重回亞洲本位的努力，一方面試圖藉此對抗歐美，重建自我的認同，另一方面也是藉此爭奪霸權，希望日本能成為亞洲的領導——特別是在中國共和革命後的發展令其經歷從充滿期望到徹底失望的轉變後。雖然內藤及其同時代人的類似研究或著述背後有自我殖民乃至雙重殖民的問題，而且在當時特定的時空環境下，往往導致為侵略張目之未意圖的後果，²⁷ 但他們的成果卻無法以政治上或道德上的是非簡單地加以揚棄，而仍是我們今日無法避開或繞過的學術累積與挑戰。特別是像內藤氏的學生宮崎市定，不但撰寫《中國史》(1980) 與《東洋的近代》等書(1992)，更主編《世界の歴史》、《図説世界文化史大系》等書系，把觀察與論述的視野拉大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其貢獻實不容忽視（參見岸本美緒 2007；佐竹靖彥 2008）。畢竟，如我在前面提過的，正確地理解、概念化前現代的社會，是跳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兩大重要支柱之一。批評西方有族群中心主義說來簡單，但要確立自己的文明在歷史上曾有何發展，又有何特色，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不能空口說白話，不能只有立場，而必須有紮實的資料與研究來佐證與支持，西方文明所開展出的現代性的確不過是諸種可能之一。

個人以為，魯曼所提出的分支分化、中心／邊陲分化、階層分化

26 關於近代、近世、現代指稱什麼、是否同義、與 "modern" 的關係又為何，以及日本學者如何建構這整套論述並據以分析中國史，是個複雜的問題，此處無法詳論。意者可參見我「比較及其超越？從唐宋變革及 early modern 談『中國』歷史分期」演講（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週五論壇」，2010年12月17日）整理稿中一些簡短的討論。

27 例如參見陳瑋芬、黃丞儀(Cheng-Yi Huang)、Joshua A. Fogel、Stefan Tanaka 等人的討論。

與功能分化的結構類型學，是能從世界史與人類史的宏觀背景，對不同文明與地區做有意義的比較，同時又不致落入生產模式所預設的線性演化觀的有力參考架構。如果我們改從社會分化形式的視角切入，探討不同的文明由哪些分化形式組成，在歷史上有何轉變、軌跡又如何，將可有效釐清彼此各有何短長。譬如，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重構華夏文明的發展的話，將發現功能分化在中國的發展不但遠比西方來得早，如雇傭勞動的使用或是飛錢、紙鈔與錢莊等發明；而且也表現出不同的樣貌，例如西方世俗化的形式是宗教譴責社會變得世俗化，中國則是社會責怪宗教變得世俗化，另外像公私區分與公共領域的發展，或是「運動」的發展軌跡與文明化的樣態，也都有異於西方。²⁸ 從這個視角出發，就不會誤以為中國過去長期居於領先地位不過是氣候、地理環境等有利條件促成的，而會了解到社會組織因素實扮有重要角色。因為，如果像 Goldstone (2009: 134) 所說，促成工業革命的關鍵在於打破階層分化的藩籬，讓思想家、企業家、工廠主、技術工人與技師等不同群體得以走到一起，形成不斷創新的文化，那麼宋代以來的中國正是人類第一個平民社會，至少是第一個後貴族社會 (Fogel 1996)。了解了這一點，我們當不會訝異於中國在都市、物質與消費文化的發展遠較西方早表現出「現代」的特徵。²⁹

如果我們不再急於否認台灣與華夏文明的淵源，把與「中國」³⁰ 交疊的那段過去看做急需擺脫的愚昧、落後狀態，而能改採正面肯定，同時也批判地對待的態度的話，我們或許會發現，「19 世紀末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經濟生產大致上仍持續一種『維生農業』的形式」（頁 74），恐怕是經不起史實檢驗的刻板印象。此外，我們可能不會同意台灣「基礎行政權力的發展，萌芽於清朝統治末期台灣建省之後」（頁 107）這樣的判斷，大概也會重新斟酌「1860 年的開港」

28 這方面的討論請參見我自博士論文以來的相關著作。

29 例如參見王鴻泰、李孝悌、巫仁恕以及 Samuel Adrian M. Adshead 等人的相關討論。

30 「中國」的內涵與指涉範圍在歷史上其實是變動不居的，是個需要重新加以問題化的概念（呂春盛 1995），此處無法討論。

的歷史意義，是否真地構成第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頁 139）。同樣地，我們或許會覺得有必要重新考慮「傳統漢人社會不愛打官司」（頁 202）的說法，以及「情、理、法」的位階（頁 211-212）是否足以適切地掌握到漢人社會傳統的法律文化（林文凱 2006a, 2006b）。

其實，「現代性的在地化發展」是本書明白標舉的立場與視角，而且坦白說已做的相當不錯。比較可惜的是，或許是一來追的還不夠遠，再者多數作者可能不會想到過台灣或中國竟會有早於西方的「現代」發展，所以才會導致對混雜的注意有時仍稍有不足，以及未注意到本土現代性的瑕疵。例如，林津如雖然注意到台灣前現代的家庭關係其實非常複雜多元，在台灣這個移民社會其實存在各種變異的家庭實踐，可是其行文似乎還是默認在台灣，「女性與父系家庭產生依附關係，沒有家庭以外的生存空間」（頁 287-8），以致忽略了宗教，特別是民間宗教（如齋教），曾創造了像「齋姑」、「菜姑」這樣的角色，讓女性得以營家庭模式以外的另類生活(Tsung 1978)。

當然，正視本土現代性的發展不意謂著昧於西方十九世紀以來取得優勢的事實。畢竟，華夏文明雖在功能分化的發展上遠較西方來得早開始，卻不夠徹底，像契約的使用雖盛行，地方與行會等也有一定的自治，宗教也早世俗化了，但始終欠缺相應的制度化保障。特別是未能在不同功能系統間發展出成熟的結構耦合機制，以致政治系統始終占有優位，像紙鈔便常因為應付政、軍急需而告崩潰，而世俗化的民間宗教則總是被看成政權的威脅。於是，政治系統最後只好訴諸道德來整合社會，結果卻導致陰陽二元結構的盛行，而非走向徹底的功能分化(Tang 2004)。只是，如果多數人目前傾向接受 1500 年左右現代（世界）社會開始形成，而西方十八世紀雖有工業革命，但其實際優勢卻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才告確立的話(Goldstone 2009: Ch. 7)，那麼如何去填補從十六世紀現代社會的開端，到十八、九世紀功能分化模式在西方確立之間的時間落差，恐怕是必須思考的議題。我以為，如果我們把唐宋變革以來功能分化在中國的發展，以及蒙古對歐亞大陸的影響考慮進來，或許有助於為這段空白填上內容。

此外，文明比較分析的視角也促使我們追問，現代性文明的內涵究竟為何，以致可以跨越各種地理的與社會的疆界，為不同的人群與國家所接受與擁抱，「越是要否認現代性的單一普遍性，越是證成現代性的單一普遍與無遠弗屆」（頁6）。如果我們接上 Durkheim 與 Mauss 的傳統，認為文明意謂著跨越地域與國族的界限，或許可以考慮 Eisenstadt (2004)所建議的，把現代性視為由科技的快速進步所驅動的「新」文明，從而一方面有助於調和現代性究竟是單一還是多元的爭議(Arnason 1988; Schäfer 2004)，另一方面也可反省到現代性可謂文化與自然上下優位關係的某種逆轉，以致有如不受控制的脫韁野馬，造成不少破壞與災難，實有必要好好列個清單計算得失(Wallerstein 1995: 113-137)。或許是因為本書是本地學界關於現代性探討的起步之作，因此編者們把主要目的設定在了解台灣的現況為何，只期許自己能為未來的批判立下基礎，以致全書並不以批判見長。這完全是正當且可理解的，只是看到少數幾位作者似乎傾向樂觀地擁抱現代性，而較少一併點出其負面或陰暗的一面時，我不免還是覺得有點遺憾，畢竟我們並不缺乏這方面的思想資源。

誠如編者們引用魯曼所說，身處現代的情境，我們「失卻一個外在的阿基米德點……『反思當下』的自我觀照任務，注定只能是不完全的，也只能是自我矛盾或弔詭的」（頁5）。儘管實情如此，我們卻毋需悲觀與消極，反而更應積極向社會、向歷史學習如何與弔詭共存，以開展弔詭來掩蓋、遺忘弔詭。這不但是因為部分比整體還有反省能力，而且我們總是有時間可以運用。實踐（邏輯）總是帶有時間的，而非如邏輯般抽離時間，以致只能陷入矛盾，卡住不得動彈的死胡同。雖然我們喪失了外在的保障，而二階觀察又不斷地揭露各式各樣的偶連性，但內部認知網絡彼此連結的運作，仍會決定暫時穩定的觀察固有值為何，從而提供了取向與變革的依據（湯志傑 1998: 40-42）。如果說台灣現代性研究是有待積極參與的共業，如果「現代性的種種組織制度……和現代性的概念……都在衝擊和形塑台灣的歷史進程」（頁58），那麼兩者間的關係為何，如何互相影響，以及所

謂「文化習性」（頁94）的問題，都仍有待後繼者以更細緻的方式釐清。

最後，我想呼應本書努力的方向，對前述探尋前沿視角獲得落實的可能性條件做點後設的討論。一定意義上，我同意 Sztompka (2011) 所說，卓越是學術的唯一標準，而本土不必然證成傑出。然而，卓越與傑出通常是需要（時間）投入與（成果）累積的。而且，退一步來說，本土研究雖不保證卓越，卻總開啓了另一種視角，允諾了提出不同觀察的可能性，從而有潛力端出傑出的，也就是與眾不同的 (distinguished) 研究成果。畢竟，如果我們不先換副眼鏡，恐怕永遠只會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而不知道竟還有自己看不到的東西在。如果我們打一開始就祭出卓越與傑出的嚴格標準，而不願投資仍充滿探索性質，以致風險甚高、前景並不確定的本土現代性的研究，更不願花時間耐心等待成果累積的話，不難料想，卓越的正當理由將導致的唯一結果，必然是扼殺建立自己研究傳統與創造傑出研究成果的可能性於萌芽之初，以致我們總是只能拾人牙慧，追附歐美、日本、印度、拉美……的驥尾之後。若是如此，我們日後恐怕不只要不斷地「反思當下」，也將一再地徒呼負負。本書已為我們踏出充滿希望的第一步，希望我這些借題發揮探尋前沿視角可能性的幻想不致太離譜，仍能與本書主文構成和諧的共鳴，刺激大家一同反思台灣現代性的問題，善哉！

參考文獻

- 卜正民(Timothy Brook)(2009)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黃中憲譯。台北：遠流。
- 內藤湖南(1992)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見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頁10-18。北京：中華書局。
- (2004)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夏應元選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佐竹靖彥(2008)從宏觀的立場理解唐宋變革的歷史性質。見黃寬重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 呂春盛(1995)關於中國大陸學界「歷史上的中國」概念之討論。台灣歷史學會通訊4: 53-58。
- 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編(2005)現代性基本讀本。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岸本美緒(2007)發展還是波動？——中國「近世」社會的宏觀形象。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 林文凱(2006a)清代土地法律文化：研究取徑與理論進展的評析。法制史研究10: 223-251。
- (2006b)土地契約秩序與地方治理——十九世紀臺灣淡新地區土地開墾與土地訴訟的歷史制度分析法制史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宮崎市定(1980)中國史，邱添生譯。台北：華世。
- (1992)東洋的近世。見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頁153-242。北京：中華書局。
- 許倬雲(2009)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台北：時報。
- 湯志傑(1998)社會自主性如何可能？以盧曼的系統理論拓深台灣社會自我描述的初步構想。當代136: 36-53。
- (2005)觀察現代／現代觀察。聯合報10月27日。
- (2009)民主社會的結構可能性條件。思想11: 197-200。
- 葛兆光(2011)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見葛兆光著，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頁171-197。台北：聯經。
- 魏而思(John E. Willis, Jr.)(2001)1688，宋偉航譯。台北：大塊文化。
- 顧忠華(2006)台灣的現代性：誰的現代性？哪種現代性？。當代221: 66-89。

- Adshead, Samuel Adrian M. (2000) *China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Arnason, Johann P. (1988) Social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s. *Thesis Eleven* 20(1): 87-105.
- Arnason, Johann P., Shmuel N. Eisenstadt,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2005) *Axial Civilizations and World History*. Leiden: Brill.
- Blumenberg, Hans (1983)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race, Richard M. (1961)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Cohen, Paul A.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y, Gerard (2006) Modernity and the Escape from Eurocentrism. Pp. 266-278 in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Gerard Delanty. London: Routledge.
- Dirlik, Arif (2000)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Glob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 Pp. 25-48 in *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 Post-eurocentric Historiographies*, edited by Arif Dirlik, Vinay Bahl and Peter Gra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Dussel, Enrique (1998) Beyond Eurocentrism: The World-System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Pp. 3-31 in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World-System and "Trans"-Modernity.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3(2): 221-244.
- Eisenstadt, Shmuel N., (ed.) (2002) *Multiple Modernities*. London: Transaction.
- (2003)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Two Volumes*. Leiden: Brill.
- (2004) The Civilizational Dimension of Modernity. Pp. 48-66 in *Rethinking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Saïd Amir Arjomand and Edward A. Tiryakian. London: Sage.
- Fogel, Joshua A. (1996) Issues i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in East Asi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History Teacher* 29(4): 425-48.
- Frank, Andre Gunder, and Barry Gills (eds.) (1993)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Routledge.
- Fritscher, Wolfgang (1996) *Romantische Beobachtungen: Niklas Luhmanns*

-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als moderne soziologische Romantik.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2(1): 35-51.
- Goldstone, Jack A. (1998)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1(3): 249-284.
- (2009) *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 Boston: McGraw-Hill/Higher Education.
- Green, William A. (1992) Periodization in European and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1): 13-53.
- Gumbrecht, Hans Ulrich (1978)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Pp. 93-13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 4*, edited by O. Brunner, W. Conze and R.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 Hollister, C. Warren (1992) The Phases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Middle Ag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1: 1-22.
- Kishimoto, Mio, (n.d.)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ies'*. <http://earlymodernworld.uchicago.edu/kishimoto.pdf>
- Koselleck, Reinhart (1985)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002)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 Pp. 154-169 in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hmann, Niklas (1988) Tautology and Paradox in the Self-descriptions of Modern Society. *Sociological Theory* 6(1): 21-37.
- (1995a) Why Does Society Describe Itself as Postmodern. *Cultural Critique* 30: 171-186.
- (1995b) The Paradox of Observing Systems. *Cultural Critique* 31: 37-55.
- (1998) *Observations on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rdue, Peter C. (1999) China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Shortcuts, Myths and Realities. *Education about Asia* 4(1): 21-26.
- Schäfer, Wolf (2004) Global Civilization and Local Culture. Pp. 71-86 in *Rethinking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Saïd Amir Arjomand and Edward A. Tiryakian. London: Sage.
- Sztompka, Piotr (2011) Another Sociological Utopia.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0(4): 388-396.

- Tang, Chih-Chieh (2004) *Vom traditionellen China zum modernen Taiwan*.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 Toulmin, Stephen Edelston (1994)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Tsung, Shiu-kuen Fan (1978) *Moms, Nuns and Hookers: Extrafamilial Alternatives for Village Women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 von Glahn, Richard (2003)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p. 35-70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5)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London: Verso.
- (1999) The West,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Pp. 10-56 in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sch, Wolfgang (2002) *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Wills, John E., Jr. (1979) 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 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 Pp. 203-238 in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edited by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is, J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